

水官与清代河西走廊基层社会治理

潘春辉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水官与清代河西走廊基层社会治理密切相关。水官全权负责河西地区水渠修建与维护、分水均水、议定水规以及处理水事纠纷等, 是地方水利事务的管理者, 也是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者。由水利管理达到社会治理, 是水官在地方治理中核心作用的体现。水官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是认识历史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社会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 清代; 河西走廊; 水官; 基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4) 01-0125-05

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 水与区域社会之间存在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将水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一直是学界的重要课题。河西走廊地处我国西北戈壁沙漠边缘, 气候干燥, 水资源缺乏, “不足之日多, 有余之时少”^①。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历来是该区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②近年来, 笔者关注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的研究。^③在此基础上, 本文就水官在清代河西走廊地方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弊端展开讨论, 以期为历史时期地方水利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专管渠道: 水官之职责

水官是清代河西走廊水利事务管理的核心力量。河西走廊水资源匮乏, 农业用水往往不足, “若无专管渠道

之人, 恐使水或有不均, 易已滋弊”^④。选拔专职和尽责的管水人员进行水利管理, 对河西地区公平用水、化解水利纷争以及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清代河西管水人员的名称各地不同, 并且还设有不同级别, 大致有管水乡老、水利乡老、水利老人、渠正、渠长、水利、渠甲、田峻郎、水首等, 有时还设有副职。本文将其统称为“水官”^⑤。

清代河西水官的主要职责均与水利事务密切相关, 主要包括水渠修建与维护、分水均水、议定水规以及处理水事纠纷等。

1. 水渠修建与维护 水渠修浚是水官的重要职责, 其工作主要包括渠坝的修建以及渠道的日常维护。清代河西地区水渠的修建往往由水官发起, 召集民夫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1XZS0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XJC770002);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潘春辉,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 西北历史地理。

① 张珩美修、曾钧等纂:《五凉全志》卷2《镇番县志·地理志》,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 第240页。

② 学术界关于清代河西走廊水利研究多集中于水利开发、分水制度以及水利纠纷史料的梳理等, 参见王培华:《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纷争及其原因——黑河、石羊河流域水利纠纷的个案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王培华:《清代河西走廊的水资源分配制度——黑河、石羊河流域水利制度的个案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并成:《明清时期河西地区“水案”史料的梳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等。

③ 潘春辉:《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农史》2009年第4期;潘春辉:《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3期;潘春辉:《水资源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26日。

④ 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之《沙州卫·水利》,酒泉: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第490页。

⑤ 此处的“官”泛指“管”,而并不特指其身份为“官”。

体出工完成。史载“近渠得利之民，分段计里合力公修”^①，各家按粮派夫，共同完成，“各坝修浚渠道绅衿士庶俱按粮派夫”^②。一般情况下，修建小型渠道所需经费由水官、民众自行筹集。如镇番县水利老人，“倡捐四百两，发当营息，充为修渠之资”^③。修渠筑坝后，水官还需日常巡视，及时发现并处理险情，确保水渠及时修理，“各坝水利乡老务于渠道上下不时巡视，倘被山水涨发冲坏，或因天雨坍塌以及淤塞浅窄，崔令急为修整不得漠视”^④。其工作一年四季各有侧重，在春季清明左右挑修渠道、堤岸，遇有溃决以及渠道被风沙积压、水流不通，及渠沿堤岸颓壤时，随时用柴草、树枝、沙石加以修补，以备立夏开渠。盛夏时节尤其在六七月间，如遇水涨或闸坝坍塌、渠水泛滥，则“需巡查修筑”。秋收后往往集体修浚渠坝以备来年春耕。冬日风多，“或飞沙堆积沟渠壅塞，则加以挑浚”。在水渠修建与维护中，水官、民户分工合作，“历代相传，法良意美”。^⑤

从程序而言，水渠的日常维护并不需上奏县衙，只需由水官自行发动民夫前往修浚即可。如若修建较大的水利工程，水官需要上奏县属，由县令颁给执照方可兴工，有时县府亦会拨付一定的水利经费。如雍乾年间山丹县疏浚白石崖水渠，由于工程浩大，先由水官将水渠图样呈交县府，随即县府发给修浚执照，水官会同渠内民夫前往修浚。再如，雍正年间安西皇渠修建即由官府出资，“每年由藩库拨给修理瓜州等处渠工银二百四十六两”^⑥。水渠修建与维护中，水官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分水与均水 分水清代河西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大事，一般在立夏开渠日正式展开。分水时节，各渠长、水官汇聚坝口，由水官全面负责分水事宜，地方官则派人或亲自监督。水官分水需严格按照水规进行，正如诗文所言：“分水不是抡才典，也要亲掺玉尺量。”^⑦有时上下坝口还需派民夫前往监督，具体至各户分水量则按用水名册进行。水老保管各项用水名册，并以此为

据进行分水，“各坝各使水花户册一样二本印，一本存县，一本管水乡老收执，稍有不均据簿查对”^⑧。《敦煌县志》记载敦煌县分水过程如下：

渠正二名总理渠务，渠长一十八名，分拨水浆，管理各渠渠道事务，每渠派水利一名，看守渠口、议定章程。至立夏日稟请官长带领工书、渠正等至党河口，名黑山子分水，渠正丈量河口宽窄、水底深浅、合算尺寸、摊就分数，按渠户数多寡公允排水，自下而上轮流浇灌，夏秋二禾赖以收稔。^⑨

立夏分水日地方官带领工书至分水口监督分水，渠正总管水利及每年的具体分水事宜。渠正下设渠长分管各渠渠道事务，每渠又专设水利一员，负责看守渠口、制定水规等事项。渠正、渠长、水利等各级水官在分水时节，至河口丈量河口宽窄和水底深浅，合算尺寸，按渠户数多寡公平分配水源，确保自下而上轮流浇灌。史载“其坝口有丈尺，立红牌刻限，次第浇灌，水利老人实董成焉”^⑩。即坝口宽窄、浇水时间、浇灌次序、用水多少等皆由水利老人负责。

3. 议定水规 在水资源匮乏的河西地区，水规是公平用水的制度保障，议定水规成为水官的另一重要职责。一般而言，水规的议定需该渠水官、绅耆、士庶代表等共同商议决定，县府一般不参与，水规议定后还需上呈县府。为确保水规的有效性，往往刻水规于石碑之上，立于水渠之旁。如清敦煌普利渠渠规遭人破坏，致用水混乱，于是合渠绅衿、农约、水官、坊甲人等“公到会所”，重新“议定章程”，^⑪从而确保了水规的有效执行。水规议定之后，各坝水利乡老还需不时劝谕化导农民，“不得强行邀截混争”^⑫，劝导民众遵守水规，防止民众强占混争水源。如光绪年间高台县丰稔渠与小鲁渠争水案，在各渠水官“会同履勘”下，^⑬查明事故原因并议定新的水规。

① 刘郁芬：《甘肃通志稿》之《民政三·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69页。

② 马步青、唐云海：《重修古浪县志》卷2《地理志·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77页。

③ 谢树森、谢广恩等编撰，李玉寿校订：《镇番遗事历鉴》卷6“康熙四十二年癸未”，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0年，第246页。

④ 马步青、唐云海：《重修古浪县志》卷2《地理志·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77页。

⑤ 李廓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第1章《河西之农业概况》第1节《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⑥ 刘郁芬：《甘肃通志稿》之《民政四·水利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82页。

⑦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卷11《艺文志·立夏赴各渠口分水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

⑧ 马步青、唐云海：《重修古浪县志》卷2《地理志·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77页。

⑨ 苏履吉、曾诚：《敦煌县志》卷2《地理志·渠规》，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21页。

⑩ 张昭美修、曾钧等纂：《五凉全志》卷4《古浪县志·古浪水利图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72页。

⑪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卷11《艺文志·普利渠渠规碑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⑫ 马步青、唐云海：《重修古浪县志》卷2《地理志·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77页。

⑬ 徐家瑞：《新纂高台县志》卷8《艺文·知县吴会同抚彝分府修渠碑志》，载张志纯等校点《高台县志辑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5页。

总体而言,清代河西水官的职责明确且具体,史载:

应查明境内大小水渠名目、里数造册通报,向后责成该州县农隙时督率……或筑渠堤,或浚渠身,或开支渠,或增木石木槽,或筑坝蓄泄使水归渠中,顺流分灌,水少之年涓滴俱归农田,水旺之年下游均得其利,而水深之渠则架桥以便行人。其平时如何分力合作,及至需水如何按日分灌,或设水老、渠长专司其事。^①

从上可见,一地水渠名目、里数、如何修渠、在哪里修渠、分水、日常修浚、水利纠纷的调处等皆由水官具体负责。而州县长官则为督率者,如农闲时监督分水、批准修渠、拨付水利经费等。水官在清代河西地区水利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确保渠坝修建与维护、分水均水以及议定水规等事务正常进行的关键因素。

息事宁人:水官与水事纠纷调处

水官在清代河西走廊水利纠纷的处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水利纠纷的调处,实现用水秩序的和谐和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河西走廊水资源短缺,民众视水脉为命脉,在水源枯竭的年代里,不遵水规、违规浇灌之事多发。史载:“年年均水起喧嚣,荷锄如云人语繁,细刻分阴晷,一滴俱关养命源。”^② 民众对分水一事亦甚为重视。^③ 公平分水成为河西地方社会治理的重大事件。因水而起的水事纠纷成为清代河西地区讼案的主体,“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端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如武威之乌牛高头坝,其往事可鉴已”^④。水利纷争成为当地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的核心。清代河西地区水案数量多、影响大,争水双方矛盾尖锐、不易化解,持续时间长、牵涉人数多,成为影响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从古到今,这里每县的人民一致认为血可流,水不可失,持刀荷锄、互争水流、断折臂足,无一退让,死者、伤者一年之内不知多少,足见问题之严重与真实性。”^⑤ 如古浪县川六坝与长流坝两处争水,自康熙年间持续至民国时期,期间断断续续争控多次,“近年以来天多苦旱争端因之愈甚”^⑥。再如山丹县,“乃于开渠杜坝

之时,每因多争一勺竟至讼起,百端罗致多人屡日难决”^⑦。清代河西地区民间冲突往往与水利纠纷相关联,且矛盾难解、易于激化。

在此背景下,专司分水及解决水利纠纷的水官的作用日益凸显。《镇番县志》对水官处理水利纠纷的基本原则记载到:

夫河渠、水利固不敢妄议纷更,尤不可拘泥成见,要惟于率由旧章之中寓临时匀挪之法,或稟请至官,当机立决,抑或先差均水以息争端,毋失时、毋偏枯斯为得之,贤司牧其知所尽心哉。^⑧

即水官处理水案时,既不能随意妄议纷争,又不可拘泥成见,需在“率由旧章”的基础上,“寓临时匀挪之法”灵活处理,赋予水官在水案处理中较大权力。日常小型水利纠纷由水官根据水规全权处理,若水案较大难以断决,则需上奏官府,由水官作出案件报告报呈县府批示,其总的原则即为“毋失时、毋偏枯”。

以下以镇番水案为例来观察水利纠纷调处中水官的具体作用。我们看到,水事纠纷的处理程序一般先由水官作出公议,然后上奏县府,县府据此作出裁断。这就是说,基层水官的公议结果是水事纠纷案件裁断的基础。乾隆十三年(1748)镇番县屯户与坝民互争水利,控于县府。镇番县府命当地水老确细勘察,作出公议结果。随即各坝水老等实地查勘,形成公议:“春水四坝以清明次日起,六坝亦以清明次日起,冬水四坝以立冬第五日止,六坝自第六日起至小雪日止,相应附勒碑内并垂不休。”^⑨ 争议地亩的浇水规章由水官公议裁定,并上奏县府,县府据此作出定论。在水案公议的形成过程中,水官拥有很大发言权,其公议结果直接左右着案件的最终判决。

在水案的处理中,水官因熟知民情与水情,拥有丰富水利治理经验,往往可找到较好的纠纷解决途径,所作公议因此能够得到争议双方的认同,可以做到“息事而宁人”,^⑩ 保证用水公平和实现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乾隆年间,镇番县四坝下截红沙堡与狼湖二沟土民在议搭橙槽行水一事上,争议不休控于县府。对此四渠坝水

① 刘郁芬:《甘肃通志稿》之《民政三·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69页。

② 赵仁卿:《金塔县志》卷10《金石·谷雨后五日分水即事》,金塔:甘肃省金塔县人民委员会翻印,1957年。

③ 李廓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第1章《河西之农业概况》第1节《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④ 张昭美修、曾钧等纂:《五凉全志》卷4《古浪县志·地理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79页。

⑤ 江戎疆:《河西水系与水利建设》,载《力行月刊》卷8《水利整治》。

⑥ 马步青、唐云海:《重修古浪县志》卷2《地理志·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77页。

⑦ 黄璟、朱逊志:《山丹县志》卷5《水利·五坝水利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65页。

⑧ 许协、谢集成:《镇番县志》卷4《水利考·蔡旗堡水利附》,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36页。

⑨ 《民勤县水利规则·敬告全县父老昆弟切实奉行民勤县水利规则》,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

⑩ 南济汉:《永昌县志》卷3《水利志》,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

老等经过实地查勘,认为“下截修筑橙槽实系沙河无底,难以相立”,对议搭橙槽行水一事作出调整:“将狼湖二沟二百有零钱粮水利,亦从新河一牌使水,按立坪口两个,由西面浇灌”。该议定结果“同众确议情愿”,^① 争议双方皆无异议,水事纠纷得以解决,一度紧张的民众情绪得以缓解。

实际上,水利浇灌规章等一旦由水官议定后即具有较强约束力,成为日后解决水利纠纷的主要依据。乾隆年间,镇番县头坝土地被风沙掩盖,头坝民户呈请县府酌地移垦于北边外红沙梁开种,故由四渠坝水老裁断将头坝长行三口夏水给各坝分浇,以此换取牌隙秋水三十昼夜,各坝头人且有甘结在案。然,十余年后,大二坝民户却复争红沙梁三十日秋水,双方复控于县府。对此县府主要依据之前水老议定章程断勘,^② 因有水官议定的水利章程,故水案顺利解决。在此期间,由水官主导制定的水利章程在水利纠纷调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史称,清代河西地区“水是人血脉”^③,因水而引发的纠纷始终存在,这也成为影响清代河西地方治理的关键因素。如何合理解决水利纠纷,也是衡量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标志,水利纠纷的调处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看到,河西地方水官通过重新定水规、调处水利矛盾等活动在化解民间水利纷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解决水利纠纷、维护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并最终实现地方社会治理的息事而宁人。

经理不善:水官之弊

水官在清代河西地区水利事务管理、纠纷调处以及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在基层权力运行中水官积弊较多,又影响和制约着水利事务的管理和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这是我们认识水官与清代河西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时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重要侧面。

清代河西水官之弊首先表现为争当水官,选举舞弊。如光绪年间酒泉县渠长选任中出现弊政,史载:“洪水坝

四闸绅耆农约士庶人等,为军兴以后每岁争当渠长,兴讼不休,有误工程,致碍农业……四闸轮流又按十四渠挨当,自十二年起每逢冬至挨次公举,勿得徇情滥保,而偏党不公,以碍水程农业。”^④ 酒泉县绅耆农约士庶人等争当水官,在每年进行的水官选举中恐出现徇情滥保、偏党不公的现象,为此诉讼不断,影响到地方水务与农业发展。水官选举舞弊,自然有碍水利事务管理的正常运行,同样造成社会不安。

惰慢尸位,扶同作弊,是清代河西水官的另一弊病。清代河西地区水官消极怠慢,不勤职务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如山丹县自乾隆年间下五闸合渠民众兴修白石崖以来,“奈未几物换星移,临河一带磨户并附近居民乘间而侵水者某某,侵地者某某,而今而后倘无有过而问焉者,上下三千二百石官粮之渠口尽为渔人逐利之场矣”^⑤。山丹下五闸居民侵地侵水却无人管理,水官惰慢尸位,上下渠口成为渔人逐利之场。古浪县“兹因水夫经理不善,于嘉庆二十年两造争讼”^⑥。水官管水不力,造成水利混乱。再如,清代酒泉县渠长每年需更换闸椿两道,但也往往“有名无实”,“以危坏栋梁”^⑦ 充数,水官作弊,损害水利,滋生新的社会纠纷,成为社会治理混乱的源头。

河西水官之弊还表现为水官各怀私见,损人利己。由于清代河西走廊对所选水官出自上游或下游没有严格规定,^⑧ 造成上游水官为己谋利,损坏下游水利利益。光绪年间临泽县二坝上下游各推选一位渠长,高如先为下游渠长,认为上下游水渠分设渠长易产生“实权分歧、隔阂易起”的不利局面,“若渠长不得其人,下号田禾屡受干旱,每年秋收荒歉堪虞”。于是高如先提议上下游水渠仅设一名水官,以专其责。然而“奈两号首领昧于大义,各怀私见执迷不悟,未得如愿。以致民国十年,下号竟受大旱”^⑨。水官不能将上下两号民众利益通盘考虑,导致下游农田受旱。

水官利用一己之权额外多占水时之现象较为普遍。

① 《民勤县水利规则·敬告全县父老昆弟切实奉行民勤县水利规则》,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

② 《民勤县水利规则·敬告全县父老昆弟切实奉行民勤县水利规则》,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

③ 许协、谢集成:《镇番县志·凡例》,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5页。

④ 《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酒泉、张掖、武威)》第6章《水利》第2节《灌溉方法》,载《农林部垦务总局调查报告》第1号,南京:农林部垦务总局编印,1942年。

⑤ 黄璟、朱逊志:《山丹县志》卷10《艺文·建大马营河龙王庙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441页。

⑥ 马步青、唐云海:《重修古浪县志》卷2《地理志·长流、川六坝水利碑记》,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77页。

⑦ 《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酒泉、张掖、武威)》第6章《水利》第2节《灌溉方法》,载《农林部垦务总局调查报告》第1号,南京:农林部垦务总局编印,1942年。

⑧ 对山陕地区渠长的选任,韩茂莉的研究认为渠长基本上产生于渠道中下游地区,以此来制约上游地区,维护中下游渠段的用水权力,渠长人选来自下游渠道的原则通行于山陕两地各大灌渠。参见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⑨ 《创修临泽县志》卷12《耆旧志·高如先传》。

史载：“查得每年渠长恒由多占水时从中取利，屡次兴讼，累误众户农田水利。”“及渠长字识夫头长夫人等应占水时外，间有澜占水时者。”“各于应占水时外，润占水时，图得利肥家自厚。”^①渠长等不顾旱荒频仍、饥馑荐臻，滥占水时从中取利，民众因此屡次兴讼，农业生产受到牵累。更有甚者，水官还操纵水权，据民国时期《民勤县水利规则》记载：“民勤水利规则创于清初康熙以还……一百余年来河夫会首操纵水权，习弊相仍。”^②水官操纵水权，积弊日滋，水政日坏。

种种水官之弊直接影响到河西地区水利分配不公与社会不稳。究其原因，为保证水官利益，清代河西水官从其被选举出任起，就相应地有一些优惠条件，因而致使人人争当水官，滋生腐败。

水官管理中的漏洞与官府监督缺失，同样导致弊政的产生。清代河西县府对水官具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如水官的选任需得到县府认可、水官不能尽职尽责、偏私徇情则会受到惩处等。^③但上述水官的选任、奖惩等事项，却往往由所谓的“总寨公所”或“会所”等民间组织发起。“公所”由地方绅耆、各渠渠长以及士庶代表组成，农闲时节召开会议，“每于八月十五日渠长散工下坝之后，均以十六七八等日，本年渠长转集四闸，众等

齐来总寨公所共同交付，本年水工茷茷账簿于众户由四闸众等公举正直数人，接阅乾坝水时人工茷茷账簿清查众户”^④。议定内容主要包括渠长的选举、水官的奖惩、渠规的修订等。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府不会直接参与，官府的督率作用缺失。其议定结果需上奏县府，但由于县府对水官奖惩的具体操作不甚了解，加之官府对“总寨公所”或“会所”等组织的放权，由公所议定的结果上奏县府后，随即会得到官府认可。由于官府监督不够以及缺乏严密的组织与管理松散，易于造成水利弊政。

“水利问题实为河西吏治之中心。”^⑤清代河西走廊水资源匮乏，水利事务管理在当地社会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水资源能否公平分配以及水利纠纷能否合理化解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社会的有效治理。实际上，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水资源管护和分配问题，而是一个基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问题。对水官设置，时人所谓“俾民不起争端”^⑥，这一方面是指在水利管理及水利纠纷调处中实现用水环境的和谐有序，另一方面，强调通过水利的有效治理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由治水而达到治民，由水利管理到达社会治理，这是水官在清代河西地方治理中核心作用的体现。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酒泉、张掖、武威）》第6章《水利》第2节《灌溉方法》，载《农林部垦务总局调查报告》第1号，南京：农林部垦务总局编印，1942年。

② 《民勤县水利规则·敬告全县父老昆弟切实奉行民勤县水利规则》，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

③ 清代河西县府对水官的管理措施，如乾隆七年（1742）甘肃巡抚黄廷桂奏：“掌渠乡甲有徇庇受贿等弊，按律惩治，并枷号渠所示众。”（《清高宗实录》卷181）如果情节严重还会上奏县衙，严肃处理。如乾隆八年（1743）古浪县水规中规定，“如有管水乡老派夫不均，致有偏枯受累之家，禀县拿究。”参见马步青、唐云海《重修古浪县志》卷2《地理志·水利》，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77页。

④ 《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酒泉、张掖、武威）》第6章《水利》第3节《灌溉方法》，载《农林部垦务总局调查报告》第1号，南京：农林部垦务总局编印，1942年。

⑤ 李廓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第1章《河西之农业概况》第1节《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⑥ 长庚：《甘肃新通志》卷61《职官志·循卓下》，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89页。